



西南边疆民族文库·西南边疆史丛书
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



尤中
◎ 著

中国西南民族地区 沿革史

(先秦至汉晋时期)

民族出版社



西南边疆民族文库·西南边疆史丛书
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

尤中◎著

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沿革史 (先秦至汉晋时期)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沿革史. 先秦至汉晋时期/尤中著.
-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4.10

ISBN 7-105-06614-8

I. 中... II. 尤... III. ①民族地区-政区沿革-研究-西南地区-先秦~晋代 ②民族地区-地理沿革-研究-西南地区-先秦~晋代 IV. K9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09278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http://www.e56.com.cn>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金若龙文化工作室微机照排 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3 字数: 340 千字

印数: 0001-2000 册 定价: 35.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文编辑二室电话: 64228001; 发行部电话: 64211734)

《西南边疆民族文库》

学术顾问：

王钟翰 宋蜀华 马 曜 尤 中 李 埏 张文勋

出版编辑委员会：

主 任：方 铁

副主任：林文勋 李 杰 和少英

成员（按姓氏笔画排列）：

马大正 邓启耀 方 铁 李绍明 李 杰

杨德华 和少英 林文勋 贺圣达

《西南边疆史丛书》主编：王文光

目 录

第一章 先秦时期的西南民族地区	(1)
第一节 西南民族地区是中国境内最早 有人类居住的地区.....	(1)
第二节 巴国的领域	(17)
第三节 蜀国的领域	(25)
第四节 滇国的领域	(37)
第五节 夜郎牂牁地区	(47)
第六节 邛都地区	(55)
第七节 笮都地区	(61)
第八节 冉駹地区	(64)
第二章 秦、汉时期的西南民族地区	(69)
第一节 秦朝时期的巴郡、蜀郡、黔中郡 及在“西南夷”边缘地区设置的县	(69)
第二节 西汉伐南越后在南方和西南 设置的郡县	(97)
第三节 西汉开“西南夷”设置的郡县.....	(116)
第四节 东汉继西汉之后在“西南夷” 地区设置的郡县.....	(182)
第五节 东汉时期交趾、交州刺史部西南的郡县.....	(216)

第三章 三国时期的西南民族地区	(227)
第一节 蜀汉在西南民族地区设置的郡县	(227)
第二节 吴国在西南民族地区设置的郡县	(276)
第四章 晋朝时期的西南民族地区	(315)
第一节 西晋时期的宁州	(317)
第二节 东晋时期的宁州	(356)
第三节 两晋时期的梁州、益州 有少数民族的郡县	(378)
第四节 成汉统治下的西南民族地区	(392)
第五节 两晋时期的荆州武陵郡和天门郡	(395)
第六节 两晋时期的交州	(399)

第一章 先秦时期的 西南民族地区

第一节 西南民族地区是中国境内最早 有人类居住的地区

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是中国境内最早有人类居住的地区，而且，这里是人与猿的共同祖先古猿的栖息地。人是由猿发展演变而来，这已经成了科学的定论。而云南境内古猿化石的发现，证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是人与猿的共同祖先古猿栖息的地方。

1956~1957年，在云南省开远县小龙潭第三纪褐煤层里，先后两次共发现10颗古猿牙齿化石，定名为森林古猿开远种。森林古猿是人和猿的共同祖先，但所属许多种类之间性状还有一定程度的差别。而旁遮普腊玛猿属的结构与人类相近。随着世界上有关这方面的新材料增多，至20世纪60年代，有人重新综合研究了50多种第三纪古猿，把腊玛古猿从森林古猿类中划分出来，明确归入人的进化系统——人科，作为人科的早期成员。同时，1957年在云南省开远县小龙潭发现的5颗牙齿，被认为是属于

腊玛古猿的^①。

1978年，在云南省禄丰县城北九公里的庙山坡石灰坝煤场的第三纪褐煤地层里，发现一颗古猿的下臼齿和一些哺乳动物化石。接着，1978年12月，在该地掘到了一个完整的古猿头骨化石。据测定，这个古猿生活的年代距今800万年以前^②。截至1981年底，禄丰县共发现腊玛古猿头骨化石6个，西瓦古猿头骨化石两个，古猿上下颌骨破片30多件，附连于颌骨的牙齿200多个，单个牙齿500多个^③。禄丰古猿的发现，轰动了世界人类学界，日本《读卖新闻》说：“800万年前的腊玛古猿在中国发现头骨，人类起源于亚洲的学说再度突起。”1978年3月中旬，云南省联合考古队在元谋县的竹棚、小河地区进行考古发掘，在小河村蝴蝶梁子发现的古猿牙齿化石，系“蝴蝶腊玛古猿”（新种），距今约为300万至400万年，它是“东方人”（同时发现的古人类牙齿化石，距今大约250万年）的直系祖先。“蝴蝶腊玛古猿”的发现，找到了从禄丰腊玛古猿和元谋猿人之间存在的两个重要环节，填补了我国乃至全世界从猿到人进化过程中的重要环节^④。

古猿在长期的攀援生活中，逐渐学会了用前肢摘取果实，用木棍或石块抵御野兽的侵袭，慢慢使手和脚有了分工，“这就完成了从猿转变到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⑤。古猿转变为人之

① 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1~2页。

② 见徐庆华：《世界上第一个800万年前古猿头骨的发现》，载《科学实验》，1980年第1期。

③ 见吴汝康等：《达尔文和人类起源的研究》，第20卷第2期，1982年。

④ 见《元谋地区古人类考古发掘获重大成果》，载1987年4月6日《光明日报》。

⑤ 见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

后，在他们的生产、生活活动中，在西南地区的很多地方留下了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的不少文化遗址，今分别列举如下。

一、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分布

1965年5月1日，在云南省元谋县上那蚌村西北部，发现两颗猿人牙齿化石，定名“元谋人”，经科学测定，“元谋人”生活的绝对年代距今170万年左右。1987年又在元谋县竹棚、小河地区发现41枚古人类牙齿化石，命名为“东方人”。经研究，“东方人”生活的时间距今250万年，比“元谋人”早80万年。“东方人”和“元谋人”是中国境内现在已知的最早的人类，它比“北京人”、“蓝田人”的时间都早，又在“元谋人”化石出土的地方发现一些旧石器。这些旧石器加工比较粗糙，和贵州黔西观音洞旧石器文化早期的石器相似，而更加原始。元谋人就用这些原始简陋的工具，为自己的生存与大自然进行艰苦的斗争^①。

1964年，在贵州省黔西县沙井公社观音洞发掘到一个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称为观音洞文化遗址。这个文化遗址是解放后发掘到的长江以南最大的一个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遗址，出土的打制石器总数在3000件以上，以不修台面的打击法和垂直锤击的第二步加工为其制作特点^②。

云南省呈贡县龙潭山也发现古人类颅骨化石。它是一块棕褐色、石化程度较深的颅顶左侧部残片。化石出土地方的下部，还有厚达1米以上的灰烬层，证明那时人们已经能用火并会熟食了。他们使用的工具是打制石器。制造石器的石料，有的是砂岩、石英等，有的是燧石、火成岩、矿石等。他们制作石器的方

① 参见汪宁生：《云南考古》，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3页。

② 见李衍垣：《夜郎故地上的探索》，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页。

法是打制，采用锤击法和碰砧法。在他们遗留的灰烬里，有牛、鹿等 10 多种哺乳动物化石。这些动物属于“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以此可以判断呈贡猿人与北京猿人同一时期^①，是元谋猿人的后继者。

1972 年，在贵州省桐梓县九坝公社岩灰洞发掘到两枚人齿化石，经鉴定为一青一老的两个“古人”，已较“猿人”进步，定名为“桐梓人”。岩灰洞内出土的烧骨，为华南地区原始人类较早期用火的原料。遗址中还发现 5 件有人工打击痕迹的石器，其加工技术的垂直打击法，可在“观音洞文化”中找到渊源，说明与“观音洞文化”有密切的承袭关系^②。

1973 年，在贵州省水城特区艺奇公社的硝灰洞中，发掘到一枚老年男性的左上犬齿化石，经鉴定亦属较之“猿人”为进步的“古人”。同时出土 53 件打制石器，它的不修台面的打片方法，说明与“观音洞文化”有密切的关系；而锐棱砸击法，则是这种“水城人”石器加工的特点^③。

1975 年，在贵州省兴义县顶效公社发掘到一个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被称为猫猫洞文化遗址。遗址中出土打制石器在千件以上。某些石器的刃部，是磨制成的，骨锥的尖端还磨得比较光滑，已属于较“古人”进步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新人”（“智人”）^④。

1960 年，在云南省丽江市漾弓江木家桥发现 3 根人类股骨，其中一根左股骨石化程度较深。1975 年，又在同一地点发现人头骨一个，属少年女性。此头骨具有一定的原始性，总的方面又

① 见于希贤：《滇池地区历史地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 34～35 页。

② 见李衍垣：《夜郎故地上的探索》，第 4 页。

③ 见李衍垣：《夜郎故地上的探索》，第 4～5 页。

④ 参见汪宁生：《云南考古》，第 3 页。

和现代人接近，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新人”（“智人”）^①。从额面上部扁平程度及最小额宽等方面来看，丽江人明显地具有蒙古人种特征。在中国广大地区，包括与云南邻近的一些省份发现的“新人”阶段的古人类，如四川的资阳人、广西柳江人和麒麟山人等，也都具有蒙古人种的特征。这就证明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一两万年以前），南方和西南地区的原始居民的种族是相同的，他们正是南方和西南少数民族的祖先^②。

1965年，在云南省西畴县东南半公里的石灰岩溶洞（“仙人洞”）中，发现了5枚人类牙齿化石。这5枚牙齿不属于同一个体，从形态特征看，已接近现代人，即属于“新人”（“智人”）阶段。同时出土的动物化石共32种，有黑鼠、竹鼠、猫熊、剑齿象、水牛等。其中现已灭绝的有6种，证明“西畴人”的地质年代和丽江人一样，同属更新世晚期^③。“西畴人”亦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新人”（“智人”）。1987年3月，在云南曲靖市沾益花山珠江源头的水洞中，发现一块旧石器晚期的人类下颌骨化石，当与“西畴人”相近。

1961年，在云南省路南县城附近及板桥河沿岸，发现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打制石器的方法是以砾石天然磨蚀面为台面，用锤击法，打击点比较集中。路南的旧石器以石片石器为主，云南省其他地方的旧石器也是这样。而在云南邻近省份也发现一些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遗址，出土打制石器各有自己的特点。如四川汉源县富林遗址发现的旧石器形体较小，很像细石器，与云南任何地点出土的旧石器都不同；广西百色发现的旧石器很少是以石片制成，基本上是砾石石器；广西东兴发现的旧

① 见汪宁生：《云南考古》，第4页。

② 见汪宁生：《云南考古》，第5页。

③ 见汪宁生：《云南考古》，第7页。

石器亦以石核石器为主；广西来宾、柳江，贵州桐梓、水城以及青藏高原发现的打制石器又另有特色。但是，云南的旧石器和邻近各省的旧石器一样，第二次加工较少，砾石的表皮仍然保存，一般就破裂面加以打击加工等等，这些又是共同的特点。这说明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中国西南和南方各地的原始居民，在文化上即各有自己创造的特点，又相互有一定的联系^①。

1951年，在四川省资阳县黄鳊溪发现一个人类头骨化石，被命名为“资阳人”。“资阳人”属于“新人”（“智人”）类型，为一女性，年龄在50岁以上，其生活的时代相当于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绝对年代距今数万年至十余万年之间^②。

1956年，在四川省成都羊子山土台遗址的下层，发现5件打制石器。1972年，在四川省汉源县富林镇发现一处旧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石片、石核、灰屑、树叶印痕、哺乳动物化石等。据有关方面的初步研究，其时代相当于旧石器时代的中期或晚期^③。

西南各地众多的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存在，强有力地证明了从旧石器时代初期至晚期，从“猿人”阶段到“新人”阶段，西南各地都有人类在这里进行劳动和生息。

二、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分布

大约在距今一万年至四千年之间，中国各地的原始居民都先后跨入了新石器时代。西南地区也一样。新石器时代，西南各地文化遗址的分布，较之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分布面更为广阔。

（1）云南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分布面，从滇东北的昭通地

① 见童恩正：《古代的巴蜀》，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页。

② 见童恩正：《古代的巴蜀》，第4页。

③ 见于希贤：《滇池地区历史地理》，第35～37页。

区到滇西南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从滇中的滇池周围到滇南的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其中有 30 多个县内都有数量不等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发现了不少新石器时代原始居民使用过的石器。

滇池周围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就发现了 20 多处。海源寺遗址，在昆明第十四中学操场，距滇池约 4 公里；官渡遗址，在螺峰村，距滇池约 5 公里；石子河遗址，在呈贡县大海晏村，距滇池约 300 米；石碑村遗址，在呈贡南部，距滇池约 5 公里；古城遗址，在呈贡县安江村，距滇池约 1.5 公里；团山村遗址，在晋宁县晋城西北部，位于滇池东岸，距湖边约 150 米的山坡上；渠西里遗址，在晋宁县城（昆阳）东部，距城约 4 公里，距滇池约 1.5 公里；兴旺村遗址，在晋宁县城（昆阳）东部，距城约 1 公里，距滇池约 0.5 公里；后村遗址，距晋宁县城（昆阳）约 1 公里，距滇池约 3 公里；石寨山遗址，在晋宁县晋城西北部，距滇池约 3 公里的山腰上；老街遗址，在昆阳，距滇池约 2.5 公里；河泊所遗址，在晋宁县晋城西部白塔村东蔡家坟，距滇池约 6 公里；白塔山遗址，在安宁县东南部白塔村东边山上，距白塔村约 300 米。此外，象山、乌龙铺、安江、王家滩、山嘴头、螺蛳山、光山等处，都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滇池周围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是云南省内最为密集的地区，说明滇池周围是新石器时代云南境内人们活动的中心地区。滇池周围又有两个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的集中点，即晋宁附近和滇池东北岸。这里当时又集中了较多的人口，便于经济、文化的交流和生产技术的提高，为以后这两个地区首先由聚落进一步发展为城市打下了基础^①。

滇西洱海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1939~1941 年间，吴金鼎、曾昭燏在洱海西岸的点苍山麓发现了从新石器时代至南诏

^① 见汪宁生：《云南考古》，第 12 页。

时期(唐代)的文化遗址二三十处,并对佛顶、马龙、龙泉、白云4个遗址进行了发掘。佛顶峰的两个遗址和马龙遗址的早期为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又解放后在洱海东岸的金梭岛、鹿鹅山、大墓坪和五里桥等地,也发现了石器和陶片^①。遗址分布在山的缓坡或小山上,个别在洱海中的小岛上(如金梭岛)。洱海周围地区新石器文化遗址的分布面也比较广阔,北及剑川、鹤庆,南达祥云、宾川。近年还在宾川白羊村发掘到一处新石器文化遗址,从文化内涵来看,也属洱海新石器文化的范畴^②。洱海地区也是新石器时代云南境内人们活动的中心地区之一。

金沙江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1972年~1973年间,在云南省元谋县大墩子进行了两次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发掘,出土了大量的文物。其中房屋遗迹发现十余座,都是长方形的地上木结构房屋。墙基的做法是先挖柱洞,与洛阳仰韶文化房屋建造之法相同^③。经放射性碳素测定,元谋大墩子遗址的年代是公元前1260年 $\pm$ 90年。又在四川西昌礼州等地,亦曾发现与元谋大墩子出土器物略同的文化遗物。此外,姚安出土的石器等物表明,那里似亦有同类文化存在。则元谋大墩子遗址可能代表着分布于金沙江中游及其支流(如安宁河、蜻蛉河)地区的一种新石器文化^④。

澜沧江中、上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1973年,在云南省云县境内的澜沧江及其支流顺甸河汇合处的忙怀村附近的山腰上,发掘到了新石器时代的石器和陶片。石器中大量存在的是一种打制而成的有肩锄。这种锄不但不加磨光,甚至刃部也很

① 见汪宁生:《云南考古》,第15页。

② 见汪宁生:《云南考古》,第15页。

③ 见汪宁生:《云南考古》,第19页。

④ 见汪宁生:《云南考古》,第21~23页。

少进行第二次加工。由于陶片和制陶工具的同时发现，证明其为新石器时代遗址。类似的文化遗址在云县和景东的澜沧江两岸发现好几处。怒江上游地带的福贡县一带，也发现打制的有肩石锄。这种有肩石锄在四川雅安和内蒙古一些地区也曾有发现^①。

滇东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1954年，在滇东北的鲁甸县马厂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1959年，在昭通县闸心场又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发现的石器有斧、镑等，为长方形扁片状，磨制很精。其中有一件是有段的。出土的陶器为一种夹沙灰陶，部分表面打磨光亮，外敷一层黑色陶衣。这两个遗址年代不明，从石器和陶器的制作技术看，比云南其他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进步，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②。

剑川海门口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1957年，在云南省剑川县海门口发现一处较大的新石器时代末期的文化遗址。经科学测定，这个遗址存在的时间是公元前1150年 $\pm$ 90年。出土的石器有斧、镑、刀、镞、锥、纺轮、砺石和装饰品等。石斧多是椭圆柱形。石刀为半月形，上面有双孔或单孔，刃多在凸面。其中多数形制与洱海地区出土的相同，但一般磨制得比较精致。同时发现了14件铜器，有斧、钺、刀、凿、鱼钩、手镯等。剑川海门口的文化遗址是新石器时代末期的文化遗址。

(2) 贵州省境内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也不少，近年来发现的有威宁县中河、赫章县可乐区柳家沟、毕节市青场、平坝县白云等遗址。又发现磨光石器的地点有威宁、毕节、赫章、清镇、平坝、盘县、贵阳（乌当）等17个县市，共出土和征集到150余件新石器时代的磨光石器。器形有斧、镑、锄、有孔石刀、刮刀、凿等。全部石器中，有肩、有段的斧、镑占一定比例，如威

^① 见汪宁生：《云南考古》，第24页。

^② 见李衍垣：《夜郎故地上的探索》，第5页。

宁、水城两地的 38 件石铤中，有段石铤达 11 件^①。1977 年，对赫章县可乐区柳家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进行了一次小型的试掘，发掘到了獠牙形石凿、磨光石斧、椭圆形双孔石刀等。同出的陶器以夹砂灰陶为主，纹饰简单。1978 年初，在毕节市青场征集到当地出土的磨光石器 65 件。其中以长方形的石铤数量最多（31 件），次为各式石斧和半成品。1978 年，在平坝县白云庄，发现了飞虎山的新石器文化洞穴堆积，出土磨光的斜刃石铤 3 件；共存的陶片亦以灰砂陶为主，有弦纹、细绳纹、波浪纹等纹饰^②。

（3）四川省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分布也很广阔。除成都平原之外，东起三峡，西北至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境内，西南至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安宁河、雅砻江流域，都先后发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东部的巫山（1997 年划归重庆市）大溪文化遗址，先后在 1957 年和 1959 年进行了两次发掘，发掘了墓葬 214 座之多，出土器物有石斧、石铤、石凿、网坠、鱼钩、箭镞、纺轮等生产工具；罐、釜、簋形器、曲腹杯、碗、豆等生活用具；耳坠、玦、珩、璜等装饰品。这些出土器物代表了从新石器时代中期到晚期的不同发展阶段，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江汉地区的屈家岭文化都有关系^③。1964 年，在理县建山寨和汶川姜维城，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其纹饰与西北地区的马家窑文化相似。1975 年，在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安宁河流域也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数处。

（4）西藏地区也先后发现了一些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和遗物。

① 见李衍垣：《夜郎故地上的探索》，第 6~7 页。

② 见童恩正：《古代的巴蜀》，第 4 页。

③ 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 171 页及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编：《昌都卡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年版。

而以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最为重要。

昌都卡若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后期。1978、1979年进行了两次发掘，获得不少文物。经初步测定，卡若遗址存在的时间为公元前 3085 ± 190 年 ~ 公元前 2005 ± 120 年。遗址中发现数十座不同结构的房屋基址。第一种是方形半地穴式木骨泥墙建筑；第二种是地面建筑，有的房屋四角还保存着柱洞，倒塌的墙壁土块夹有草茎并遗留柱槽痕迹；第三种是结构新型的长方形石墙建筑，在半地穴的四壁用自然卵石垒砌墙黄泥抹缝。遗址中发现的石工具以打制石器最多，有大、小型的刮削器和敲砸器，还有相当数量同属于我国细石器传统的锥状、棱柱状、扁体小石核和石叶；磨制的斧、镑、刀、凿、镞等石器较少，其中各式穿孔石刀较为突出。陶器多灰色和红色，主要是夹沙陶，泥质陶少，纹饰有刻画纹、绳纹、细堆纹和很少的彩陶，尤其以刻画组成的各种图案花纹比较丰富多样，基本器类多属小平底的罐、盆、钵。

除昌都卡若遗址之外，西藏地区的新石器遗物皆为调查采集而得，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基本上是细石器。1956年，在那曲县（黑河）发现一件石核。1966年，于喜马拉雅山南麓的聂拉木县，发现亚里村、羊圈两处制石器地点。在亚里村全新世石灰华顶层中，出土一件有修理痕迹的半锥形石核；还在地表采集到锥形石核、小石叶、小石片和圆头刮削器等20多件石制品。大部分为一般细石器中所常见，其中的扁锥形石核与黑河的石核很相似。除细石器之外，属于石片石器的圆头刮削器，还带有旧石器的外貌。1976年，又在藏北申扎县珠洛勒、卢令，双湖的玛尼、绥绍拉等5处地点，采集到上百件典型细石器，以火石、燧石、凝灰岩、碧玉和玉髓等为主要材料，最多的是楔形、锥形和柱形石核，还有石叶、石片和刮削器等。西藏发现的细石器，与广泛分布于北方的细石器属同一传统。与细石器不同的是另一类磨制石器和陶器的新石器时代后期遗物。1974~1975年，在林